

第六章 結論

壹、研究心得

筆者研究前承蒙指導老師提示對研究過程中文獻資料篩選與檢證應需多予注意的指導下，個人僅從美國與中共智庫學者對本研究議題可獲得的素材資料中以比對或歷史事件經驗法則，檢視與彙整相關之文獻俾利能藉由較完整文獻資料的支持使本研究能得以透過文獻及歷史研究方法的過程徑獲致一具價值的推論或看法。惟誠如研究過程中指導教授朱新民老師、李英明所長及王高成所長等師長前瞻、遠矚之殷切提醒，在研究學習過程中的確是遇到前述老師們所預見可能發生的問題，而這些可能困境與問題將成爲個人未來更深入的探究事實與真相的動力。僅就研究過程中所見的問題摘述如後。

一、中共核武文獻資料蒐整與引用的可信度方面

就一般的研究而言，雖然西方資料中對於中共飛彈種類、射程和酬載等狀況顯示看法是頗爲一致，但對於其飛彈部署數量多寡，從研究中發現其看法是相去更遠，甚至連美國官方部門公布的料資料也有此等問題。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中共未曾公布有關其飛彈和核武計畫資料；第二，中共也未曾與任何國家進行有關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因此他也不必要透露其飛彈數量或限制其所擁有的飛彈數量；第三，目前中共陸基飛彈大部分具機動性並部署於各種非傳統基地中(含洞穴、森林與山谷中)。雖然或許從外國公開資料中可能可以得知中共主要飛彈部署概況，但對中共實際所擁有彈道飛彈數量和其實際部署狀況則難確定。因爲只要中共不簽署各種國際戰略武器管制協定(含可查證機制)，則各種對中共飛彈與發射架數量估計，將永遠會有存在這誤差可能。

二、研究議題取向方面

對冷戰後中共核戰略研究，美國學者似乎較關注於其核力量變動及其戰略準則執行能力與對外行爲因應方面，並常藉此以預測未來中共走向進而提出可能相應準備的建言。就我國方面的研究，由於缺乏長期對中共國防資源、科技能力與核武現代化資料的系統綜整，以致除議題上較偏於量或戰略部隊能力分析，且多以中共爲單一研究主體外，更甚少關注對其未來走向或與美國的互動問題。但以研究所得美、俄間未來核武實力消長的整體研析心得，在 2007 年美、俄完成第二階段戰略武器裁減目標後雙方概將維持 2,000-3,000 間枚核導彈，而中共假定持續建設其核武規模，則與美蘇間相對力量差距勢必會有改變（中共預計有 500 枚中程導彈其中包含 300 枚多彈頭導彈）。因此，這種可能引發美國去實質進行核武裁減決心顧慮，當然也影響到中共在實力改變下所引導

出不同的決策認知或對外行為模式。因此，從此例證來看，未來在此研究議題上上仍待筆者強化對前述論的述檢視與研析。

貳、研究發現

第一、中共核武戰略形式與特點為何方面

冷戰時期，中共發展部署核武器過程是謹慎，它是兼顧現實和突破現實需要選擇。同時它不同於，美、蘇是在現代科學及工業基礎下去發展其核武，中共一開始即寄望從潛艦及其他戰略武器計畫研發途徑去獲得另外一種組織、創新，及奠定他們爾後長期科學及工業優勢發展的基礎，進而以利增進其國家安全與國際地位。因此，冷戰時沒有任何事可以撼動毛澤東早期藉由核武發展重建中共國際地位夢想。與蘇聯結盟是其建立國際地位的一著棋，同樣戰略性武器也成爲其達成此一政治目標的重要手段工具。

同時冷戰前後中共核武發展。在個人決策方面主要是以毛澤東的核戰略觀爲主，企圖從全面銷毀或持續要求核大國裁減核武下達成「以弱擊強」目標。至鄧小平以後則受「中央政治局」集體決策指導所影響。其次，從國際層次的角度審視中共核武建設，冷戰前後中共雖均感受到自美國壓力，惟冷戰前由於美俄間核武競賽，使中共能借助不同時期依附關係而獲致核武發展上的安全。冷戰後中共未避免步入蘇聯崩潰後塵，而對核武發展採謹慎及隨國力成長與安全需要而適度調整。但整體而言戰略核武仍是一種國力象徵與嚇阻強權介入的政治工具。

而其核戰略原則，仍不脫離其既有各項對外的使用原則限制，且從西方的核戰略嚇阻意義與能力來看有以下特點，首先是冷戰時期中共一直保持西方所認定的一種最低嚇阻（Minimum Deterrence）形式，且是以蘇聯爲主要核打擊目標與對象；其次，冷戰後受到國際因素影響在核武議題上雖仍維持既有原則與宣示，但似乎已開始有鬆動或調整可能。同時中共核戰略實質能力條件上，也從早期以威脅其周邊與亞太地區爲主思維，而轉至針對因應美國介入與干預防範所需的遠程洲際核打擊力量爲主。但其實質核戰略形式，則有別於美蘇可從公開文件或指導中發現，而是隱藏在中共領導者對共軍二炮部隊的具體建設指導與其戰役準則中。但無論如何多數西方分析家仍然認爲擁有遏阻能力還是中共核武策略基本主要考量。而美國情報單位和獨立智庫專家研究發現，目前北京的核政策仍然是維持基於不首先使用核武原則，並維持「有限的遏阻力」

或是「第二波攻擊的能力」。不過整體而言，中共的核武力量是有別於美國與俄羅斯而處於一種「非戒備」狀態，以避免造成意外發射危險。

第二、中共對後冷戰時期國際局勢認知及因應

中共認為冷戰結束尤其「九一一事件」後，其所面臨外在戰略壓力與挑戰相對與其戰略的機遇是次要問題，但前述挑戰壓力仍使中共對其安全隱憂產生戒心，認為雖這些挑戰雖不是直接，但置之不理則潛在破壞是不容忽視。而對美蘇冷戰後核武發展情勢看法，中共抱持負面與不樂觀看法，認為世界主流雖是和平與發展，但導致衝突與戰爭因素仍深刻的存在著；安全威脅趨于多樣化，即所謂「綜合威脅」，且重大安全威脅依然存在，只是目前處於潛在型態，而變得遙遠些，因而防備這種威脅的戰略預警準備時期將是相對較長。所以在西方對其仍保有潛在敵意下，目前其安全形勢是處於發展中有合作也有競爭，和平中有和好也有鬥爭的現實情勢下。隨著時代進步與和平力量推移，防止戰爭準備自然也相對是要增加。至於其所關切的台海戰略問題上。中共認為其與美國在台海戰略關係上是：既聯合又鬥爭。它是受到美國國內的政局以及美國在國際上的外交、軍事行動等因素影響。

中共面對新形勢因應作法。政治戰略上維持「和平與發展」主軸，依據鄧小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政策指示，持續朝擴大未來發展籌碼而追求累積綜合國力的長期戰略方向前進。但仍對外堅持其生存發展的國家統一、政局穩定及主權獨立自主之三個必要條件，並將國家統一視為最為重要的問題。

在核武戰略思維調整發展因應上，中共核武政策歷經過去內部長期檢討的爭辯。在 2000 年江澤民提出對核武建設「五個必須」時，似乎已顯示有獲致調整共識的可能。而中共認為目前僅具反擊價值目標（反擊城市）作為嚇阻的懲罰的後發制人「最低嚇阻核戰略」，它是過於被動，且是不合於他們未來的核子靈活彈性反應要求。尤其是在，面對美國飛彈防禦及傳統戰力優勢先制攻擊威脅可能下，是有必要對核武能力與發展及「不首先使用原則」等方面再做修正，而最終可能獲致的形式與結果，是要待其國內對外界情勢威脅看法一致時才能形成。但國內技術的限制將是發展主要障礙。

第三、後冷戰時期中共核戰略調整可能走向與內容

至於中共核戰略原則可能的調整方面，西方學者認為目前有中共核戰略專家主張將既有最低嚇阻構想改成有限嚇阻(有限威懾)構想。此準則演變的檢討

代表這中共核武將從「對入侵者造成損害的能力」改變成「遂行最低程度的核武戰爭能力」。一旦此種思想化為實際準則與指導，則意味著中共核武戰略準則的一重大改變，因為其已構成一種以遂行核戰的實際能力為基礎，是一種以具可信的嚇阻能力為前提的作戰準原則。

而這原則可能包含對敵高價值目標與敵部隊目標同時加以打擊的多樣化攻擊目標原則，以及在未來戰場可能動用戰術核武或空中及火砲射擊戰術核武運用。因此，以這種運用思維來分析，中共存在最低嚇阻與有限嚇阻核武準是可能的且彼此不會排斥，反而是可以在不同戰爭階層發揮相輔相成作用。因為美國從中共核武部隊所獲致心得顯示，其最低嚇阻可能是在洲際戰略導彈運用階層作戰準則；有限嚇阻(預見將遂行有限度的攻擊性核子作戰)則可能是區域性、中程、戰區階層的作戰準則。而在衝突過程的最低層級傳統彈頭的短程彈道飛彈可能被用來構成一種具攻擊性、先制性及以打擊敵部隊作戰態勢為主。整體而言，這三個階層核武部隊與彈道飛彈部隊的架構應是建構中共擁有「具可信度的嚇阻能力」的評估基準。因此，在某些戰爭階層，中共二砲部隊可能會基於攻勢核武作戰的假設而遂行戰爭是不無可能。

第四、冷戰後中共對核武角色與安全的認知

冷戰後中共對核力量角色認知方面

一、在國際地位方面。它可能是與中共國家形象有關---擁有核武器，特別是各種核武器，代表著「大國」象徵，如此才能在多極發展中與美國平起平坐；其次，與國際安全方面，在國際核武裁減未具實質成效，達到其所謂完全銷毀要求前，核武器仍是其重要嚇阻力量。

二、在與美國動向方面。美國戰略核武器動向的確是中共當局所關心，尤其美俄就依照第二個戰略核武器裁減協定裁減核武器，美國所擁有長程戰略核彈頭實力仍遠遠高於中共目前能力，且美國主要核武大多部署於機動的核潛艇上，這使中共難以偵測到甚而反制，也使中共處於不利地位；其次，雖然中共與美國雙方已達成核武互不瞄準協議，但美國拒絕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聲明，使中共擔心在雙方危機發生時，美國以其核武數量與精準優勢，可能對中共發動先制攻擊，摧毀其數量有限核武器，使中共喪失第二擊報復能力。且一旦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發展部署完成，將可以有效攔截中共數量有限的單一彈頭長程戰略飛彈，這會使中共核武嚇阻能力處於更不利態勢。

三、周邊問題方面。主要是指印度。印度一直有發展核武器，以成為世界公認的核武大國為目標。另外，中共也擔心日本走向核武的可能。理論上雖然日本發展核武可能性低，但目前其國內已開始對發展核武進行辯論，同時也有

政府內閣閣員公開主張，日本應該發展核武，及對擬以飛彈攻擊日本的國家可以採取先發制人式的攻擊。這些主張都會使中共當局感到不安。

四、維持國防工業方面。這主要是與其規模龐大的核能與太空工業有關。中共建政後建立起包括核能與太空在內規模非常龐大的國防工業。雖然自 1980 年實施改革開放以後，在國防工作領域也相應實施「軍轉民」政策，以減輕國家負擔。但在缺乏市場經濟因素下，中共當局不可能任令市場機制影響其國防工業，否則其國防工業有瓦解的可能。因此，持續改善核武能力可以使其保持不易獲得的工業能力與資源。

第五、亞太安全威脅認知下中共核武現代化的決心

在面對亞太美國可能圍堵與美國單邊主義及傳統優勢武力下，中共認知不論在正規軍力或戰略武力上多將面臨嚴重挑戰。因此，冷戰後中共建軍備戰整體佈局上乃以「建設一支能打贏局部戰爭，保持有限核武威懾力量之現代化國防力量」為核心，一方面牽制超強美國，以強大軍力達成其成為區域霸權目標，另一方面則以控制臺海情勢、阻滯美、日安保方針之遂行為核心。在戰備準備上，中共軍隊對台鬥爭準備，瞄準的不是台灣軍隊，而是美國等可能插手之強敵。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後，中共軍方開始慎重地評估將如何有效嚇阻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支援台灣的作戰能力，列為其建軍備戰的要項。因此，如何有效懾止美國對中共軍事干涉與軍事介入或最大限度地制約美軍介入程度，是新時期中共軍事鬥爭戰略指導重要課題與籌劃基點。其中儘快形成足夠而有效的「殺手鐮」武器，為中共當前建制對外作戰能量之重點工作。

但中共如果近期有大幅擴充核武計畫跡象，主要原因應受是美國對台灣立場影響。有學者觀察中共對美國發展飛彈防禦系統關切似乎已明顯降低，主要是認為美國飛彈防禦計畫距離實現還有很長一段時間。而目前中共所擔心的將是美國所揭示發展太空實力目標，並藉以提升其軍事能力方面。一旦美國進行這方面發展，再加上近期美國「核武態勢檢討」提到發展低能量核子彈頭和在非核戰條件下使用這類武器，會讓中共更為擔心美國未來可能利用這些形成的優勢，迫使中共在台海問題上接受美方立場。而這自然可能會使中共核武發展進展上被迫加速。

近年來，中共領導人雖也明確表示，一個有限但具長期發展的核武目標是中共國力與威望所繫，也關係著北京行使獨立自主外交能力及支持中共在國際上地位。顯示中共似乎堅決通過現代化計畫來改進其核武庫，預估到 2015 年以前，中共射程能到達美國的飛彈數量可能有會到達目前十倍。並且他也藉由發

展道路機動及固態燃料的洲際彈道飛彈與更新穎的潛射彈道飛彈等二種飛彈之努力來改進其洲際飛彈能力。

第六、中共核武現代化對台海安全影響與其本身可能面臨困境

中共對台海安全戰略的潛存威脅問題上，美國已開始關注中共核武器的扮演的可能角色與因應。而中共核武對美國在台海影響方面有以下幾點特點：

一、核武器在台海對峙時沒有影響是不可能的；

二、給予中共核武嚇阻想法事實上美國學者方面也僅是極少數人觀點，較多數的認為用其它更多的方式去壓抑中共行為是較符合美國利益；

三、美國也擔心其對中共的核武嚇阻有可能會失效。尤其，未來若美國在財政援助及決心與獲致能力不對稱態勢發展下，美國核威脅在此種台海複雜對峙局勢下可能翠然缺乏可信度；

四、彈道飛彈防禦是有助於美國及台灣改變中共核武嚇阻成效的，但它也並非萬靈丹；

五、在台海安全戰略存在著如多的意外狀況下與不確定下。美國有一特別重要的體認就是，一旦戰爭引起使用核武問題，美國將比中國共承受傷害的風險迫要少且仍將會於整個發展階段繼續維持這種優勢；

六、核武嚇阻時間點問題上。在今天的世界上，對峙逐步升高對中共會形成很大負荷。而這負擔同樣會使中共在軍費支出呈現一長期的升高狀態。

綜合而言不論中共選擇為何，其核武持續的現代化也必然會使中共自己可能陷入一種安全困境的迷思，進而會帶來以下的影響。

一、持續發展核武，並配合其國力持續的成長，可能使美國在未來將更不願意和其直接發生軍事衝突。這將使中共陸或許可以影響美國的某些外交政策；或者在台海對峙的抉擇；

二、中共可能更成為核武大國，這特別是在美國發展出有效的飛彈防禦系統以前。這會使中共產生與美國地位並駕齊驅的感覺。而可能使中共領導人產生錯覺，進而對其外交政策做出錯誤評估；

三、中共明確瞭解國際核武軍備控制潮流，及核武的國際政治，不致以核武輕啓事端；

四、給美國國內保守人士口實，使他們更擔憂中共軍力成長；

因此，整體而言，即中共使持續其核武器的現代化，而在中共當局認為核戰爭的發生機率非常低，且其軍事現代化方向是一種在「核威懾陰影下高技術局部戰爭」思維，核武器在未來的主要功能仍是扮演嚇阻角色，而真正作戰方式則是高技術條件下的正規的局部戰爭下。其核武現代發展仍值得觀察。